

中国高校非洲留学生教育的 多维度考察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实证研究

李明儒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框架，通过对 56 名非洲留学生及校友的深度访谈，系统考察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动因机制与体验评价。研究发现，非洲学生来华留学主要受物质层面因素驱动，包括奖学金支持、相对低廉的教育成本、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便捷的申请流程以及社会网络的推荐效应。然而，其留学满意度的核心决定因素已转向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程度。研究揭示了三个关键发现：虽然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基本保障，但在归属感建立、社会认同获得等方面仍面临文化适应、语言障碍、社交隔离等结构性挑战；自尊需求的满足呈现动态特征，非洲学生通过心理调适和学业成就支撑，展现出较强的跨文化适应韧性；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主要体现在高校层级、授课语言和学位认可度三个维度。研究表明，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影响非洲留学生“中国故事”叙事的情感基调和传播效果。为此，需通过完善奖学金机制、构建多元文化融合平台、提升教育质量、改善社会认知环境及增强学位认可度等路径，优化非洲留学生体验，使其成为中非人文交流的积极使者。

关键词 非洲留学生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跨文化适应 高等教育国际化

作者简介 李明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

引言

当前，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国际流动已成为推动全球人

才流动的重要途径。^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跨境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规模已从 1990 年的 130 万人次增至 2019 年的 600 余万人次。^② 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教育市场，美国在 2018—2019 学年共接收 1095299 名国际学生，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学生仅 40290 人，占入学总人数的 3.7%。^③ 相比之下，中国同期共招收 492185 名留学生，其中 81562 人来自非洲，占总人数的 16.56%。^④ 目前，中国已成为继英国和美国之后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国，也是仅次于法国的最受非洲留学生欢迎的第二大留学目的国。^⑤ 高频次的人才流动不仅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还形成了覆盖中国高校的国际校友网络，该网络成为中国提升国际软实力的重要潜在资源。

中非教育交流与合作是中非友好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非洲留学生作为传播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潜在使者，是中非教育叙事中不可或缺的群体，而他们在华留学经历又构成各自独特的“中国故事”。近年来，非洲留学生群体以及其来华留学所面临的挑战开始被学界关注。李安山认为，非洲留学生在中非文化沟通乃至深化中非关系中发挥着桥梁作用。^⑦ 肯尼斯·金（Kenneth King）则认为，在华非洲留学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⑧ 另有研究者关注非洲留学生的个体层面，聚焦潜在发生的种族歧视、文化冲击、沟通障碍以及学业

-
- ① Heike C. Albert and Helen D. Haz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 ②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Higher Education Figures at a Glance,” UNESCO World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 2022, https://uis.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f_unesco1015_brochure_web_en.pdf, accessed December 22, 2024.
- ③ “Foreign Students Enrolled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s://nces.ed.gov/programs/digest/d19/tables/dt19_310.asp, accessed December 22, 2024.
- ④ 《2018 年来华留学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s5987/201904/t20190412_377692.html, 访问日期：2024 年 12 月 22 日。
- ⑤ Benjamin Mulvey, “Conceptualizing the Discourse of Student Mobility between ‘Periphery’ and ‘Semi-periphery’: The Case of Africa and China,” *Higher Education*, Vol. 81, 2021, p. 438.
- ⑥ 滕珺、李笑旭、陈柳：《中国：一个新兴教育援助国的历史基础与未来挑战——基于“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的批判性文献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第 17 页。
- ⑦ Anshan Li,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Research, Reality, and Reflection,”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17, No. 4, 2018, p. 22.
- ⑧ Kenneth King, *China’s Aid and Soft Power in Africa: The Case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uffolk: James Currey, 2013.

压力等问题。^①那么，非洲留学生是否能够成为中非友好关系的桥梁？他们又是否能够讲好各自的“中国故事”？其故事的情感基调（积极或消极）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他们在华留学体验是否符合预期？本文基于对 56 名非洲来华留学生和校友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访谈数据进行质性分析，试图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面，系统梳理非洲留学生的在华体验，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中非高等教育合作中的结构性障碍与个体困境，^②以期辨识中国通过高等教育提升软实力过程中的问题，剖析非洲留学生在华生活困境的成因，同时为中国高校的国际化发展以及留学生管理提供参考。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运用与研究设计

现有关于非洲留学生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的宏观视角（自上而下），将其置于中非高等教育合作的大背景之下，回顾中非教育合作的历史，探索合作模式，进而进行政策分析等。^③其中，软实力理论被广泛运用，以探讨中非教育合作能否成为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一种人力资源投资手段和软实力来源。然而，非洲留学生是否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并成为中非关系的文化使者，与他们在华生活的满意度息息相关。现有宏观层面的研究，可能难以全面评估中非教育合作的有效性，本研究将尝试以非洲留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非洲学生在华留学生活的经历以及他们的所思所想，从微观视角（自下而上）探究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
- ① Chkaif Bouchaib, “The Sino –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 Toward Building A Literature,”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2, No. 1, 2023, pp. 1 – 14; Heidi Østbø Haugen, “China’s Recruitment of Af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Policy Efficacy and Unintended Outcomes,” *Globalization, Society and Education*, Vol. 11, No. 3, 2013, pp. 315 – 334; Xinxin Jin, Rabnawaz Khan and Xiaofeng Wu, “An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Vol. 9, No. 4, 2019, pp. 109 – 137.
- ② 笔者先后于 2017 年、2019 年、2020 年在中国、赞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进行田野调查，访谈样本覆盖不同学科、学历层次及来华年限，访谈内容涉及来华留学的原因、在华学习生活的适应程度、文化差异等维度。
- ③ Anshan Li,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Research, Reality, and Reflection,” pp. 5 – 44; Obert Hodzi, “Bridging the Asymmetries? African Students’ Mobility to China,” *Asian Ethnicity*, Vol 21, No. 4, 2020, pp. 566 – 584; 冯元：《肯尼亚本土汉语教师问题分析——以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为例》，《知识文库》2019 年第 9 期，第 165 页。

(一) 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可行性分析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① 前两者属于物质层面的低层次需求，后三者属于精神层面的高层次需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需求的顺序满足，即人通常在低层次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一旦某种需求被满足，它就不再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更高层次的需求便会凸显。^② 在马斯洛最初的论述中，完全满足一种需求是向上追求更高需求的前提条件，但他随后补充指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基本需求都部分得到满足，例如普通人大概满足了 85% 的生理需求、70% 的安全需求、50% 的归属与爱的需求、40% 的自尊需求，以及 10% 的自我实现需求。^③

留学生的求学之路恰好契合这种需求层次的动态演进，即在异国他乡，只有生命财产安全不受威胁，才会产生社交需求，有了一定程度的社交才会追求他人的尊重，当上述需求基本满足后，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就会迅速发展。非洲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层面的考量如经济负担和人身安全，也有精神层面的因素如亲友影响、获得尊重的渴望以及对自我梦想的追求。同时，非洲留学生的在华经历，如是否遭受人身财产安全的威胁，生活中是否拥有爱与归属感，是否被老师、同学和身边的中国人尊重和喜爱，以及在高校学习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达成预期目标，直接决定他们讲述“中国故事”的意愿和方式。因此，运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分析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动因与满意度具有理论适切性和现实解释力。

(二) 研究设计

对于留学生而言，在他国的生活与学习经历是评估留学经历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一是非洲学生为什么选择来华留学？二是他们如何评价在华留学经历？一般而言，留学经历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影响，如所在城市对留学生的接受度与包容度，与中国社区的融合度，所在高校的学术表现、课程设

^① Abraham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50, No. 4, 1943, pp. 370 – 396;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4.

^② Abraham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p. 375, 388.

^③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54.

置、留学生管理制度以及导学关系等。^① 为全面了解不同背景下非洲留学生的在华经历，笔者于2017—2020年在中国5座城市的6所“985工程”高校（19份）、4所“211工程”高校（11份）和3所普通高校（14份）以及赞比亚大学（6份）、内罗毕大学（3份）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1份）等16所高校开展田野调查，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性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共收集56份访谈样本，其中包括52份非洲留学生（含已毕业学生）与4份非洲三国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的访谈样本（详见表1）。^② 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约1.5小时，所有访谈均在征得参与者同意后进行录音。^③

表1 田野调查情况

田野调查地	时间	方法	参与者
中国（北京、西安、武汉、广州、石家庄）	2019年1—3月	半结构化访谈、小组访谈	前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26名来自非洲的本科生、13名来自非洲的硕士生、5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
非洲	2018年9月 (赞比亚)、 2020年1月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半结构化访谈	赞比亚 赞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4名毕业于中国高校的赞比亚大学讲师、1名即将前往中国就读硕士的学生 肯尼亚 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1名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本土汉语教师、1名毕业于中国高校的内罗毕大学讲师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中土建东非分公司经理

-
- ① Judith Eder, Wayne W. Smith and Robert E. Pitts, “Explor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 Choice,” *Journal of Teaching in Travel & Tourism*, Vol. 10, No. 3, 2010, pp. 232–250; Rodney Arambewela and John Hall, “An Empir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Satisfaction,”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Vol. 21, No. 4, 2009, pp. 555–569.
- ② 本研究所涉及的“985工程”高校有：北京大学（10份）、北京理工大学（1份）、西安交通大学（2份）、武汉大学（2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2份）、中山大学（2份）；“211工程”高校有：长安大学（1份）、华中师范大学（3份）、武汉理工大学（3份）、暨南大学（4份）；普通高校有：广州工业大学（1份）、南方医科大学（4份）、河北经贸大学（9份）。
- ③ 本研究中所有受访者的身份信息均被核实有效，依据受访者自愿原则，部分受访者要求使用化名，部分受访者要求隐去姓氏，为确保格式统一，所有受访者均隐去姓氏。

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动因调查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最受非洲留学生欢迎的第二大留学目的国？又有哪些因素促使非洲学生来华留学？基于田野调查搜集的访谈数据，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框架，本研究依照非洲留学生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自尊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五个递进层面，系统分析非洲留学生的来华动因。

（一）相对较低的留学成本与奖学金的提供

马斯洛指出，作为动机理论基点的需求通常是所谓的生理驱动力。^①就国际教育而言，出国留学的首要前提是在异国他乡维持基本生存。经济状况，特别是留学资金保障，是准留学生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来自母国的资金保证，即使获得目标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可能因为无法获得签证而错失出国留学机会。^②因此，资金保障构成留学生出国深造的基础需求，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理需求范畴。

非洲家庭通常子女众多，对于自费留学生来说，高昂的学费给自己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留学费用是决定他们选择留学目的国的主要因素之一。^③与发达国家相似，中国大学的学费也因专业而异，医学专业学费通常最高，其次是理工科，人文社科类相对较低。当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学的学费是合理和可接受的。^④宝拉是西安交通大学医学专业自费本科生，她在决定出国时表达了对留学费用的担忧。

我通过南非当地的中介机构申请中国大学，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大学的入学程序简单、学费低、学制短。我家有3个孩子，都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我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名教师，他们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作为医学生，我需要支付4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1万元人民币的住宿费，这比南非的医学院便宜得多。^⑤

①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35.

② 在留学申请环节，特别是自费留学申请，经济证明通常是决定留学签证获批与否的重要材料之一。

③ Judith Eder, Wayne W. Smith and Robert E. Pitts, “Explor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 Choice,” pp. 232 – 250.

④ Guoyang Zhang and Jiabin Zhu, “Why Did Engineering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Vol. 10, No. 1, 2020, pp. 28 – 39.

⑤ 对来自博茨瓦纳宝拉（Paula）的访谈，2019年2月22日于西安。

对于希望出国留学但面临经济困难的学生来说，奖学金是实现留学梦想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中宣布，2019—2021年共向非洲国家提供5万个奖学金名额。^① 大量留学机会的提供，成为近年来非洲来华留学热潮的重要推动力。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的赞比亚本科生卡帕亚表示，如果高中毕业后想继续深造，来华留学是他唯一可行的选择。他家境贫寒，还有两个弟弟需要上学，如果没有奖学金，高中毕业后必须打工赚钱养家，这也是他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唯一原因。^② 因此，相对低廉的留学成本和充足的奖学金供给，降低了非洲学生因经济问题而辍学的潜在风险，保障了他们来华后的学习和生活，增强了他们来华留学的信心。

（二）中国高校简化的申请流程、高录取率与广告效应

作为新兴的国际教育市场，相较于欧美国家，中国高校在入学与奖学金申请方面具有程序简化、周期短、录取率高的特点。欧美高校的录取结果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公布，而中国高校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时间先于欧美高校。对于一些非洲学生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信心等待欧美高校的录取通知书，而且即使拿到录取通知书，仍面临奖学金或签证申请失败等不确定因素。因此，他们不愿冒险，更倾向于选择来华留学。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林圭谈道：

起初，我的第一志愿是赞比亚大学（赞大），因为这是我国最好的大学。但当我得知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申请早于赞大时，我决定申请到中国留学。同时，我也申请了美国奖学金，并获得一所高校70%的学费减免。我还申请了日本文部科学省奖学金，但我在参加日本高校入学考试前收到了西安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就终止了其他申请。另外，美国和日本大学的入学年份都是2014年，而中国大学的入学年份是2013年。我想为自己节省一年时间，所以决定到中国留学。^③

此外，广告效应可以使留学目的国或该国某类奖学金更广为人知。^④ 中国政

^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官网，2018年9月5日，http://www.focac.org/chn/zywx/zywj/201809/t20180905_7875851.htm，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7日。

^② 对来自赞比亚卡帕亚（Kapaya）的访谈，2019年1月24日于北京。

^③ 对来自赞比亚林圭（Lengwe）的访谈，2019年2月21日于西安。

^④ Peter Bodcatt, “Choosing a Higher Education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 What Mainland Chinese Parents and Students Rate as Importa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8, No. 3, 2009, pp. 349–373.

府奖学金和中介机构的来华留学广告在非洲国家社交媒体中频繁出现，使非洲学生及其家人能够轻松获取来华留学信息。帕克萨高中毕业后来到中国留学，受访时正在南方医科大学攻读临床医学本科学位，他表示：

高中毕业后我打算到英国留学，但当时申请没有开放，还需要等很长时间。我上网时偶然发现一则中介机构的来华留学广告，上面介绍了如何获得去中国留学的机会。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在网上填写了一份申请表。后来，一位中国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在向他表明去中国留学的意愿后，我们签订了合同。当然，我也尝试过申请中国奖学金，但没有成功。^①

(三) 中国和平安全的国内环境

当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更高层次的安全需求就会产生。^② 艾达尔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声誉与安全感密切相关。^③ 对留学生而言，当资金问题解决后，在留学目的国的人身安全保障就成为他们在国外深造的基本需求。^④ 访谈数据表明，安全需求与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动机紧密相关。非洲高毕业生的家长非常担心子女在国外会面临安全风险，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社会治安良好，是理想的留学目标国。鲁尼谈道：“我曾经想到俄罗斯留学，但我父母非常反对。我母亲曾在中国做过贸易，她认为中国很安全。”^⑤

(四) 来自毕业于中国高校亲友的推荐

亲友建议是影响非洲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的另一重要因素。^⑥ 学生在决定留学目的地之前，会寻找能给他们建议、有过类似经历或能够支持他们的人。马斯洛认为，人们倾向于接受已知的、熟悉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陌生的事物。^⑦ 通过亲友，非洲学生可以获取留学相关的重要信息。例如，中国哪些城市对外国人

^① 对来自赞比亚帕克萨（Paxa）的访谈，2019年3月5日于广州。

^②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39.

^③ Judith Eder, Wayne W. Smith and Robert E. Pitts, “Exploring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Study Abroad Destination Choice,” 2010, p. 242.

^④ Rodney Arambewela and John Hall, “An Empirical Model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Satisfaction,” p. 563.

^⑤ 对来自赤道几内亚鲁尼（Ronney）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⑥ Nattavud Pimpa, “A Family Affair: The Effect of Family on Thai Students’ Choice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Vol. 49, No. 4, 2005, pp. 431 – 448.

^⑦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41.

包容度较高，哪些高校录取率及奖学金获得率高，哪些高校学术要求高、毕业难等。就读于暨南大学的阿尔方斯提道：“我父亲与中国有生意往来，如果我到中国留学，他可以帮助我落脚。我姐姐也毕业于暨南大学，她了解中国高校的申请流程，协助我申请到暨南大学。”^①

（五）受他人留学决定的影响与本国的升学压力

马斯洛认为，日常生活中的欲望通常具有工具性特征，即它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例如，我需要钱是因为我想买车，而我想买车是因为我的邻居有车，这样我才能维持自尊并得到他人的爱和尊重。^②这种心理机制在非洲学生身上也有所体现，即如果一个学生身边的人决定到国外学习，那么他也会想去尝试。正如鲁尼所说，高中毕业后，一些同学选择出国留学，他之所以决定来中国读书，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受到这股留学潮的影响。^③

马斯洛还指出，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有一种渴望获得对自身较高评价的需要或欲望。^④对非洲高中毕业生来说，面对等待本国大学录取结果的不确定性，还不如尽快赴海外求学，这样既能节省因漫长等待而耗费的时间，也能避免未被录取时可能遭遇的自尊受挫。在赞比亚、马拉维等一些非洲国家，高校每年招生时间并不固定，高中毕业生进入本国大学需要等待9个月至1年。^⑤鉴于中国高校录取时间通常早于非洲院校，因此来华留学为非洲高中毕业生提供了一条避免上述问题的有效路径。

（六）对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仰慕

当留学生的物质需求、安全需求以及自尊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即通过求学实现自我发展。近年来，中国科技进步成为吸引留学生来华深造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非洲学生表现出学习中国先进科技的强烈意愿，^⑥尤其热衷于申请医学、土木工程、计算机科学等热门专业。这些专业备受非洲学生青睐与中国对非援助密切相关。一方面，中国援建的医院和派遣的医疗队在非洲赢得良好声誉；另一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援建的大量基

① 对来自坦桑尼亚阿尔方斯（Alphonse）的访谈，2019年3月7日于广州。

②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21.

③ 对来自赤道几内亚鲁尼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④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45.

⑤ 对来自赞比亚雷蒙德（Raymond）的访谈，2019年3月2日于武汉；对来自马拉维伊曼纽尔（Emmanuel）的访谈，2019年3月6日于广州。

⑥ Guoyang Zhang and Jiabin Zhu, “Why did Engineering Students Choose to Study in China?” p. 32.

础设施影响着非洲人民的日常生活。同时，许多中国工程企业在非洲运营，被视为非洲留学生归国就业的潜在市场。

在中国高校医学院就读的宝拉等人均表示，他们选择来华学医正是因为感受到中国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良好的国际声望。^① 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雷蒙德说：“中国的医学技术在赞比亚非常有名，中国医生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好声誉。我想做一名医生，所以申请了中国临床医学奖学金。”^② 他的学姐基亚贝萨来华留学前已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为了进修医术，选择来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此外，以土木工程专业闻名的长安大学同样吸引了很多非洲留学生。从访谈中可以看出，一些非洲学生在留学前就有明确的人生目标，留学是他们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那么，这些非洲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能否实现自我？他们会遇到哪些困难？本研究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非洲学生来华留学的层级需求考察

一般来说，留学生在异国他乡会面临诸多挑战，如饮食习惯、文化差异、语言障碍及社会问题等。^③ 本研究围绕田野调查中非洲留学生普遍讨论的五个话题——孤独感、与中国学生和社区互动中存在的困难、对偏见的担忧、文化差异、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中国学位的价值，从物质层面的需求到精神层面的需求逐级讨论。

（一）非洲来华留学生的生理和安全需求状况

作为新兴的国际教育市场，中国留学费用具有相对优势。在受访的 13 位自费留学生中，无人抱怨中国生活成本难以负担。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校为留学生提供的宿舍价格合理，校内餐饮物美价廉、种类丰富。此外，依靠奖学金生活的非洲留学生也未反映在中国存在显著经济困难。据国家留学基金委数据，除免除学费、住宿费和医疗保险外，留学生的助学金标准为：本科生每月 2500 元，硕士生 3000 元，博士生 3500 元。^④ 在 31 位受访者中，仅 1 人表示助学金在冬季

^① 对来自博茨瓦纳宝拉的访谈，2019 年 2 月 22 日于西安；对来自赞比亚基亚贝萨 (Chiabesa) 的访谈，2019 年 3 月 5 日于武汉；对来自赞比亚林巴尼 (Lembani) 的访谈，2019 年 2 月 22 日于西安。

^② 对来自赞比亚雷蒙德的访谈，2019 年 3 月 2 日于武汉。

^③ Chkaif Bouchaib, “The Sino –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Toward Building A Literature,” pp. 1 – 14.

^④ 《中国政府奖学金招生简章》，留学中国网站，https://www.campuschina.org/zh/content/details1003_122933.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11 月 15 日。

不足以应对开销，原因是这位来自莱索托的学生不适应武汉寒冷天气，需长时间使用空调，导致电费较高。^①

在安全需求方面，受访者林圭表示：“目前中国有很多赞比亚留学生，我们的群体不断壮大。此外，我住在学校宿舍，父母从不担心我在中国的安全。”^②研究发现，非洲留学生在华期间，经济和安全问题未构成主要困扰，表明其基础需求（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已得到满足。这些需求不再是求学阶段的首要关切，更高层次的需求成为更迫切的目标。

（二）非洲来华留学生归属和爱的需求状况

1. 归属与爱的获得

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归属与爱的需求随之显现。^③这种需求驱动初到中国的非洲留学生积极融入当地社区。访谈发现，部分学生成功建立了稳定的社交网络，与中国同学和朋友培养了深厚情谊，从而在人际交往中获得归属感和爱的慰藉。整体而言，多数受访者在华期间的人际关系较为融洽。正如毕业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欧东所说：

我曾经生活在一个可爱的中国社区。我在医院与导师和同事们一起学习和工作，他们都很爱护我，尽量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受歧视。如果我的病人因外籍身份而质疑我的医疗能力，我的导师总会关心我的感受，与我谈心。有一次我们外出吃饭，导师看到一个服务员偷拍我，就直接向餐厅老板表达不满，并要求该服务员删除照片。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回到乌干达后，我每天都很想念他们。^④

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门杜（Mendo）也分享了他融入中国社区的经验：

我有非常好的中国朋友，我们经常聚餐，他们都是我的“老铁”。中国学生大都比较腼腆，我与他们建立关系的方式是主动出击，而不是等着他们来与我交朋友。起初，我主动与他们聊天，学习他们喜欢的游戏，比如狼

^① 对来自莱索托科贝（Key Bee）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② 对来自赞比亚林圭的访谈，2019年2月21日于西安。

^③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43.

^④ 对来自乌干达欧东（Odong）的访谈，2019年3月10日于广州，后续访谈与2023年8月3日通过微信语音电话进行。

人杀或麻将，当他们熟悉我之后，我们的关系就非常好了。^①

2. 归属与爱的缺失

然而，非洲学生与中国学生及社区的互动并非总能取得积极效果。有些非洲学生表示他们在融入中国社交群体时遇到困难，^② 这些困难往往导致三种结果。

第一，尽管有些非洲留学生在起初与中国社区接触时会为处理人际关系而感到疲惫，但经过持续努力，最终能够成功融入。

随着在中国生活年限的增长，我与中国同学或中国社区的交流已经不成问题。但刚到中国时，我总为此感到沮丧。起初，我认为自己会有很多中国朋友，但随后却发现我们的友谊并不稳定。在交往中，他们有时会在微信朋友圈展示我们的照片或视频，但之后便很少主动与我联系。如今，我已经理解了类似的文化差异，并学会结交和选择真正的中国朋友。^③

第二，除了不可避免的交集，如上课或参加导师举办的聚会，有些非洲学生在经历过某些不愉快或尴尬的事情后，失去了主动融入的意愿。来自赞比亚的曼布韦就表示：“交中国朋友很难，比如他们今天跟你攀谈，隔天见面就如同陌生人一样，所以我会疑虑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因此，我更习惯跟其他留学生做朋友。”^④

第三，一些非洲学生在适应中国生活后，主动融入留学生社区。这些非洲学生中多数没有与中国人相处不愉快的经历，但因语言屏障或文化差异，缺乏融入中国社区的主观意愿。

我的中国同学和蔼可亲，但我们没有太多交流；我的同学很好，乐于助人，但我喜欢和我的同胞或其他留学生一起；我参加的是英语授课项目，没有中国同学，所以我和他们没有交流。^⑤

^① 对来自喀麦隆门杜（Mendo）的访谈，2019年1月28日于北京。

^② Xinxin Jin, Rabnawaz Khan and Xiaofeng Wu, “An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pp. 109 – 137.

^③ 对来自加纳那那（Nana）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④ 对来自赞比亚曼布韦（Mambwe）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⑤ 对来自赞比亚雷蒙德的访谈，2019年3月2日于武汉；对来自赞比亚文森特（Vincent）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对来自马里圣迪（Sidi）的访谈，2019年3月4日于武汉；对来自津巴布韦普雷伊斯（Preaious）的访谈，2019年3月7日于广州。

3. 归属与爱的找寻

显然，并非每位非洲学生在融入中国社区时都能满足归属与爱的需求。那么，他们在华留学期间的精神需求是否止步于此？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部分非洲学生与中国社区关系疏离，但是非洲留学生（或更广义上的留学生）群体间关系却日益紧密，这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相符。马斯洛认为，邻里、同乡、族系、同事及熟人等关系对归属感具有深刻意义。^①因此，不难理解在华非洲留学生社区的壮大。当非洲学生与中国社区交流受阻时，他们会感到爱的缺失，间接地促使他们彼此拉近距离，在异国他乡建立起自己的社群。北京大学本科生比利说：“我更喜欢与同胞交流，我们无话不谈。但与中国同学或朋友交流时，我就必须多加思考，避免敏感话题。”^②非洲学生间建立了紧密的社交网络。这种网络既存在于国家层面（和同一个国家的留学生联系），也体现为涵盖众多非洲国家留学生的跨国群体。他们借此交流信息，拓展人脉。非洲学生与中国社区互动有限的现象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理解。

首先，对于接受中文授课的非洲留学生，课堂上的孤立感和课后交往的距离感使其倾向于亲近有相似经历的同胞或其他国际留学生，这主要源于文化差异。与此同时，多数中国学生缺乏跨文化交往经验，其爱与归属的需求更多导向身边的同学朋友，进一步限制了他们与非洲学生的交流互动。

其次，对于接受英文授课的非洲留学生，挑战更为显著。中英文课程分设导致他们鲜有机会与内地学生共同学习，加之普遍汉语水平有限，语言障碍成为首要且先于文化差异的融入壁垒，使他们在中国社区中寻求爱与归属的难度更大。

再次，高校学生管理体制（如教学与生活分离）是导致中国学生与留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产生隔阂的客观因素。^③理论上，中文授课课堂上感到孤独的留学生，若课后有充足时间和空间与中国学生交往，或能拉近双方心理距离。同样，英文授课的留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与中国学生互动，若有机会在生活中接近中国学生，亦能通过社交增进理解。然而，在高校现行管理体制下，不仅中英文教学分离，中国学生与留学生的校园生活亦彼此分隔，留学生课余时间与中国学生接触较少，致使上述融合路径难以实现。换言之，物理空间的分离直接拉大了双方的心理距离。比利从这个角度总结了他与中国同学之间的社交问题：“我不认为同学对我存在偏见（在班级的小组讨论中，同学经常不选他做队友），因为我

①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p. 43 – 44.

② 对来自赞比亚比利（Billy）的访谈，2019年1月23日于北京。

③ Xinxin Jin, Rabnawaz Khan and Xiaofeng Wu, “An Investig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p. 134.

们住在不同宿舍，日常生活中交流有限，我们彼此并不熟悉。”^①

最后，非洲学生与中国高校行政人员在处理特定事务时存在沟通模式差异，这也成为影响他们归属感的另一个因素。^② 来自赞比亚的迪迪（DeeDee）提道：

学校的生活老师在协调宿舍资源时，有时会区别对待非洲学生和其他地区的学生，比如尼泊尔学生申请使用宿舍休息室举办生日派对的流程相对便捷，但我们在申请类似机会时需要更多沟通环节。^③

总体而言，虽然非洲学生在与中国同学交往或融入中国社区时面临诸多挑战，但其归属与爱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与中国朋友、本国同胞或其他留学生的关系得到满足。

（三）非洲来华留学生自尊需求状况

个体自尊需求普遍存在于任何社会，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追求实力、成就、自信与独立，以及渴望名誉或声望。对非洲留学生而言，能否获得师生认可以及被所在城市接纳和尊重，是建立其自尊的重要基础。如前所述，非洲留学生的日常生活（包括食宿）主要集中于校园，因此其归属与爱的需求讨论多聚焦于此，但校园无法满足全部需求——他们需要外出社交、采购、旅游等。多位受访者反映，他们在校园内虽能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却常在校外遭遇偏见，这种不被尊重的感受对其留学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1. 非洲留学生经历的言语与行为偏见

基于现有访谈样本，非洲留学生在社会互动中经历的偏见，可分为言语偏见和行为偏见两类。其中，言语偏见对来华留学生群体产生一定负面影响。部分受访者反馈，在日常交流及网络场景中，一些中国人对非洲人存在刻板印象，会将非洲人与“黑人”“懒惰”“贫困”等标签化表述关联。在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城市，有非洲学生提及在校外偶因个别市民的不当言语感到困扰，这类言语对年轻非洲学生（特别是低年级本科生）的自尊造成一定冲击，使其产生不被尊重的感受。泰兰特等人提及曾在石家庄某超市购物的经历，商店经营者称“我的超市主要服务中国消费者”。^④

^① 对来自赞比亚的比利（Billy）的访谈，2019年1月23日于北京。

^② Heidi Østbø Haugen, “China’s Recruitment of Af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Policy Efficacy, and Unintended Outcomes,” p. 328.

^③ 对来自赞比亚的迪迪（Dee Dee）的访谈，2019年3月11日于石家庄。

^④ 小组访谈，来自津巴布韦的泰兰特与内维尔，于2019年3月12日于石家庄。

同样，行为偏见也在非洲留学生的社会互动中有所体现，如遭遇偷拍、陌生人异样眼光，在消费议价时被差别对待，或出租车司机拒载等，这类体验易使非洲留学生感知到社会融入的障碍。

如果陌生人征求我的同意，我不介意合影。由于我常被偷拍，以至于如今我看到有人举起手机，便会本能地有所警觉。还记得去年坐地铁四号线回北大途中，一位中年乘客在拍我时因忘记关闭闪光灯及快门声引来其他乘客注意，使我感到尴尬。还有一次，在我前往学校的路上，三四个中年女性从对面走来时对我指指点点，隐约感到异样的注视，心里不是滋味。^①

2. 非洲来华留学生遭遇的文化冲击

有学者认为，文化冲击与非洲学生的适应性密切相关。^②对中国特定地域文化的适应过程会影响其自尊构建。以武汉为例，其方言的独特性及语音语调特征较为鲜明，是当地文化的显著标识，大部分非洲学生需要一段时间适应这种文化特质。^③超过半数生活在武汉的非洲学生受访者提到，文化差异使他们在与当地人交流时感到隔阂，适应武汉生活成为他们跨文化体验的重要议题。

我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4级，能流利使用普通话，但在理解武汉方言和当地人表达习惯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④

我到武汉半年，目前还处在适应阶段。语言障碍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地人说话的语音语调特征较为突出，初接触时容易引发误会。例如，我常感到当地人在与我对话时有攻击性，让我有一种没有被尊重的错觉，但其实他们都很友善。^⑤

当然，并非所有非洲留学生都经历显著文化冲击。在广州，非洲留学生能便捷找到舒适的社交场所。例如，广州市的小北路和三元里作为非洲人群相对集中区域，深受非洲留学生青睐。在这些地方，他们不仅可以与同胞相聚交流、品尝

^① 对来自赞比亚比利的访谈，2019年1月23日于北京。

^② Alfred Presbitero, "Culture Shock and Reverse Culture Shock: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ultural Intelligence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53, 2016, p. 29.

^③ 杨瑾：《基于市民语言论素质的武汉城市语言文化建设》，《武汉商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88页。

^④ 对来自赞比亚雷蒙德的访谈，2019年3月2日于武汉。

^⑤ 对来自赞比亚文森特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家乡美食，也能获得较充分的身份认同。

3. 非洲留学生的自我适应

面对多重挑战，非洲学生如何应对负面情绪？这些情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留学经历的评价？马斯洛指出，自尊需要的满足会带来自信，使人相信自己是强大的、有能力的和有用的。^① 反之，若这类需求未被满足，可能引发自卑感、软弱感或无助感，进而削弱个体自信。对非洲留学生而言，面对挫折时的自我调节或亲友支持尤为重要。比利说，初到中国时，每当向家人倾诉生活中的不悦，母亲就会引导他尝试适应环境。托马也在访谈中表示，生活中曾多次经历不友好对待，这类体验对他的自尊心造成冲击，使他产生自我怀疑，但他优异的学术表现得到学校师生认可和尊重，助其重建自信。类似托马这样复杂的情绪交织，在非洲留学生群体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当然，非洲学生对偏见的感知与应对因年龄以及在华居留时间呈现差异。与初到中国年纪较小的本科生相比，年长学生往往具备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能更好地应对非预期社交情境中的潜在消极体验。甚至有些年长的非洲留学生都鲜少用类似“偏见”这样的词来描述特定情境下的不愉快经历。38 岁的赞比亚籍硕士研究生莫西斯（Moses）谈道：“我有过被偷拍的经历，但我并不认为这是恶意的。中国人很友好，或许只是对不同种族的肤色感到好奇。”^②

现任教于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奥斯卡博士从心理学视角讨论了非洲学生普遍关心的行为偏见问题。他认为，当个体在跨文化交流中因肤色差异成为关注焦点时，其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会自然增强，这类现象更多源于文化身份认同焦虑，而非指向性歧视。^③ 此外，非洲学生对偏见的认知并非全然负面。比利还提到中国人对非洲人同样存在“正面刻板印象”——类似于西方社会赋予“中国人很勤劳”的标签一样——即认为非洲人在音乐和竞技体育领域具有群体天赋，这实质上是一种将特定群体特征泛化为国家甚或大陆层面的标签认知。尽管部分受访者曾因偏见感到不愉快，但这些经历并未导致持续性负面影响。非洲留学生的自尊在自我调适下经历了“建立—摧毁—再建立”的过程，即文化身份认同焦虑可能导致自尊短期波动，但通过自我调适或亲友支持，多数人逐步重建自我价值认知。换言之，非洲学生的自尊体系可能因消极经历遭遇暂时性冲击，但普遍展现出适应跨文化环境的心理韧性。

①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45.

② 对来自赞比亚莫西斯（Moses）的访谈，与 2019 年 1 月 22 日于北京。

③ 对来自肯尼亚奥斯卡（Oscar）的访谈，与 2020 年 1 月 15 日于内罗毕。奥斯卡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

(四) 非洲来华留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状况

自我实现是个体追求自身潜能充分发挥的内在驱动力,^① 其实现路径因个体差异呈现多样性，但共同前提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以及自尊需求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在非洲留学生群体中，部分人在来华前已确立职业目标（如成为医生或工程师），另一部分则在来华留学期间才逐步明确发展方向。这自然引发更深层次的问题：非洲学生对在华学习生活是否满意？中国高等教育是否达到其预期，并为他们实现自我价值提供有效支持？研究发现，非洲留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度与3个方面因素有关：（1）个人学术能力发展，包括中文水平与研究能力提升；（2）就读院校的教育资源，如高校层次、学科建设水平及英语授课课程质量；（3）学位的国际认可度，尤其是中国高校学位在非洲国家的社会认可度。

1. 非洲留学生的努力与自我实现

学习能力和学业成绩是影响非洲学生自我实现需求得到满足的关键因素。当他们设定目标并通过持续努力达到目标时，其自我实现需求就会获得阶段性满足。访谈数据表明，部分非洲学生在华学习期间取得突出成绩，个别典型事迹甚至被中国媒体报道。^②

欧东的访谈叙事完整呈现了其在华追寻梦想、实现自我的历程，他的经历堪称在华非洲留学生群体的缩影。来华前，欧东是乌干达某高校大二学生，凭借优异成绩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2014年，他在同济大学完成一年汉语强化学习，随后进入南方医科大学攻读本科，并于2020年考入中山大学医学院，攻读心脏代谢与瓣膜病方向硕士学位。为积累临床经验，欧东仅用一学期修完硕士课程，随后加入导师医疗团队，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展为期两年半的实习。手术实操是其实习期间的核心任务，在访谈中他回忆道：

2020年，我开始跟导师上手术，主要以观察为主，他在术前、术中和术后对我进行技术指导。从2021年起，我与导师合作手术，3个月后在导师的指导下开始独立手术。实习期间，每周二和周四是我的手术日，每周要做15—30台手术。此外，我还需要在术前与患者讨论手术方案，术中如要更改方案，需征得患者或家属同意，术后还要写病历。我的技术能力得到上

^① Abraham H. Maslow,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p. 46.

^② 关于北京大学博士生托马的报道，<https://news.cupl.edu.cn/info/1355/23719.htm>；关于北京大学门杜的报道，<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9985636597261107970>，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日。

级医生的充分肯定，当地方医院的医生来我院进修时，上级医生通常会让我展示 1—3 台手术，我对自己的实习工作非常满意。^①

除手术外，管理病人、与患者沟通也是欧东实习生活的重要部分。

我与患者通常可以保持良好的医患关系，我深知医生不仅要治病，还要医心。我会特别关注无家属陪伴的患者，与他们聊天，帮助他们释放压力。一位每月需住院 3—5 天的女患者，每次都指定我做管床医生。我回国工作前，她还专程来医院道别，叮嘱我不要忘记做医生的初心。

从中山大学毕业后，欧东与中国女友成婚并返回乌干达。他计划在获得乌干达政府学历认证后，在当地医院担任心内科医生。欧东告诉笔者，现在他立下更高目标——将在中国所学的专业技能应用于乌干达医疗事业，推动当地医疗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中国的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更实质性满足了其自我实现需求。

2. 中国高校在非洲留学生自我实现中的作用

目前，中国有 2820 所高等院校，其中提供学位教育的院校 1275 所。^② 中国高等院校分为三个层次：“985 工程”高校、“211 工程”高校和普通高校，以满足不同学术背景学生的需求。^③ 本研究受访对象中，20 人就读或毕业于“985 工程”高校，12 人就读或毕业于“211 工程”高校，15 人就读或毕业于普通高校。研究表明，就读于一流大学的非洲学生自我实现满意度高于普通高校非洲留学生，这一差异与高校所能提供的学术资源与英语授课项目的教学质量相关，而非文化偏见。

在学术资源方面，与普通高校相比，重点大学通常享有较高国内外声誉，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发展机会，助力学生实现个人目标。“985 工程”高校的非洲留学生通常受教于学术积累浓厚、研究成果卓著的教授，这些教授通常具备国际化视野，为非洲留学生自我实现提供支持。此外，校友网络作为重要社会

① 对来自乌干达欧东的访谈，2019 年 3 月 10 日于广州，后续访谈与 2023 年 8 月 3 日通过微信语音电话进行。

② 《全国高等学校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xgk/s5743/s5744/A03/202306/t20230619_1064976.html，访问日期：2024 年 12 月 3 日。

③ Yuzhuo Cai and Fengqiao Yan,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W. John Morgan, Qing Gu and Fengliang Li (eds.), *Handbook of Chinese Education*, Edward Elgar, 2017, pp. 169 – 193.

资本，为留学生提供潜在资源与合作机会。现活跃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的喀麦隆籍北京大学校友门杜谈道：

北大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我们有很多机会见到名人，与他们近距离交流，接触先进思想。例如，在国际政治领域，我有机会在北大见到基辛格和约瑟夫·奈。我们的教授有时还会邀请外交部大使或联合国官员来校讲座，这些经历弥足珍贵，意义非凡。^①

高校层级差异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即高校英文授课项目教学质量存在差异。^②除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非洲本科生必须接受中文授课外，多数自费来华攻读本、硕、博学位的非洲学生均可选择英文授课项目。因此，英语教学质量对非洲留学生自我实现及留学生活满意度具有关键影响。研究显示，就读或毕业于“985工程”高校的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接受了高质量的学位教育，认可授课教师的专业能力、外语水平，这与刘海方教授的研究一致。^③然而，并非所有“985工程”高校的教师均具备使用流利英文授课的能力，例如赞比亚籍留学生基亚贝萨提道：

部分科目老师可以用英语授课，但我的导师英文口语较弱。为保证学术严谨，和导师讨论研究计划时，我会请懂中文的非洲朋友翻译，但我非常认可导师的专业水平，他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医生。^④

在“211工程”高校及普通高校的英文授课项目中，非洲留学生满意度似乎因学科而异。研究发现，理工科和医学专业学生对授课教师英文水平的反馈问题明显多于人文社科类学生。在访谈中，计算机工程专业本科生那那表示：“老师们上课时多照念课件，课堂吸引力不足。”^⑤土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曼布韦也提道：“虽然从属英文授课项目，但导师英文能力有限，我们之间存在沟通障碍。因为读研究生前已明确研究目标，我对导师的依赖程度较低。”^⑥暨南大学临床

^① 对来自喀麦隆门杜的访谈，2019年1月28日于北京。

^② Heidi Østbø Haugen, “China’s Recruitment of Af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Policy Efficacy, and Unintended Outcomes,” pp. 315 – 334.

^③ 刘海方：《中国对非留学生奖学金政策沿革与绩效研究》，载李安山主编：《中国非洲研究评论（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④ 对来自赞比亚基亚贝萨的访谈，2019年3月5日于武汉。

^⑤ 对来自加纳那那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⑥ 对来自赞比亚曼布韦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医学本科生谈道：“我们的专业课由中国教授和印度教授共同承担。与印度教授相比，中国教授会分配更多时间在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作为医科生，专业课与实践同等重要。虽然课堂听讲存在一定困难，但临床实践中仍能从这些医术高超的医生身上学到大量专业知识和技能。”南方医科大学本科生帕克萨对英文授课课程基本满意，“我的老师们对待教学都很严谨负责，他们的医术都很高明。尽管部分教师英文表达能力有限，用英文向我们解答课堂上同学提出的问题有些困难，但这些问题通常会在实习过程中得到解决。”^① 相较之下，华中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专业的三位受访者均表示，授课教师大多都有海外学术背景，因此与各科老师沟通无障碍，但对教学方法提出建议：“相对于讲座（Lecture）式教学，我更喜欢研讨会（Seminar）形式。讲座式教学可以拓宽知识广度，但难以让学生深入挖掘知识。”^②

3. 非洲留学生的中文水平与自我实现

非洲留学生的中文水平是影响其自我实现需求的另一关键因素，也是影响其在华留学满意度的重要因素。^③ 研究表明，即使在同一学校，接受中文授课与英文授课的非洲留学生对学业的满意度也存在差异。与帕克萨同校的卢森博等人是南方医科大学本科中文授课项目非洲留学生，他们表示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到扎实的医学知识与应用技术。

我校虽非中国顶尖医学院，但课程设置合理规范。作为国家奖学金生，我们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教授们在授课中总会主动确认我们是否能跟上课堂教学进度。目前，我在广州市南方医院实习，对学习和工作状态都很满意。^④

尽管“985 工程”高校老师的英文水平普遍较高，但中文授课的非洲本科生学业满意度显著高于英文授课的自费留学生。以西安交通大学为例，临床医学专业中文授课项目本科生林圭通过汉语水平六级考试，在当地医院实习时，凭借流利中文与出色表现获陕西媒体报道。^⑤ 然而，同学院英文授课项目本科生宝拉对留学生学术要求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

① 对来自赞比亚帕克萨的访谈，2019 年 3 月 5 日于广州。

② 对来自莱索托科贝的访谈，2019 年 3 月 3 日于武汉。

③ Obert Hodzi, “Bridging the Asymmetries? African Students’ Mobility to China,” pp. 566 – 584.

④ 对来自赞比亚卢森博（Lusambo）的访谈，2019 年 3 月 6 日于广州。

⑤ 关于西安交通大学林圭的报道，<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5497419523330619272>，访问时间：2025 年 1 月 22 日。

我与老师沟通没有障碍，他们的英文都很好。因我不懂中文，无法进入中国医院实习，所以我将回国实习。中国高校对本土学生要求严格，通过加强考核，要求他们专注于学业。相比之下，对自费留学生的要求相对宽松，甚至存在不努力学习也能通过考试的现象，这可能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①

4.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与非洲留学生的自我实现

非洲留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还受某些客观因素影响，其中中国高校学位在非洲国家的认可度值得关注。与西方教育市场相比，中国高校学位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认可度还有待提高，部分毕业生回国后在事业发展上遇到障碍，客观上影响其自我实现。半数以上受访者对中国高校学位在其母国的声誉表示担忧。

近年来，赞比亚人对中国存在一些负面认知。赞比亚市场上有较多中国仿制品，使部分赞比亚人对中国产品质量产生怀疑。这类认知延伸至对中国教育的评价，有些人认为中国教育不够专业。因此，我们毕业回国后往往需要加倍努力工作来证明自己的能力。^②

中国高等教育在博茨瓦纳的声誉较以往有所下降，这与部分毕业于中国大学的自费非洲留学生的学业表现不佳有关。这对我们这些在中国努力学习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③

简而言之，若非洲留学生回国就业遭到职场偏见，他们的自尊与自我实现感就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伤害，进而对来华留学经历做出负面评价。尽管不少非洲留学生对中国学位的含金量表示担忧，但仍有不少人通过中国学历教育实现职业发展。赞比亚大学信息科学系讲师布瓦亚硕士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他在访谈中表达了对来华留学经历的肯定：“我对在华学习和生活的经历非常满意。2010年毕业回国后，我实现了升职加薪的梦想。”^④

彼得的经历也具代表性，从天津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后，成为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本土汉语教师。他的工作职责包括为非洲学生教授中文，为当地政府官员做短期汉语培训。彼得认为凭借中国留学经历以及流利的汉语，他在求职过

^① 对来自博茨瓦纳宝拉的访谈，2019年2月22日于西安。

^② 对来自赞比亚曼布韦的访谈，2019年3月3日于武汉。

^③ 对来自博茨瓦纳宝拉的访谈，2019年2月22日于西安。

^④ 对来自赞比亚布瓦亚（Bwalya）的访谈，2017年9月8日于卢萨卡。

程中未遇到障碍，并且很享受当前的工作。^①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② 在这一背景下，非洲留学生作为中非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关键载体，肩负双重使命：一是学习先进知识以建设祖国，二是传播中国文化以促进理解，而使命的实现高度依赖他们来华留学经历的整体满意度。本文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通过对 56 名非洲留学生及校友的深度访谈，从生理、安全、归属与爱、自尊、自我实现 5 个层面，系统分析了非洲留学生来华留学的动机与在华学习生活的满意度。

研究发现，非洲学生选择来华深造，主要受物质层面因素（生理与安全需要）驱动，具体表现为中国政府奖学金提供的经济支持与相对较低的留学成本是关键推动力；和平安全的国内环境是其家长重要考量；来自校友网络的推荐及简化的申请流程、高录取率进一步降低留学门槛；而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彰显的先进科技实力（尤其在医学、工程等领域）激发了其高层次的学习诉求（自我实现需要）。

然而，当非洲学生来华后，影响其留学生活满意度的核心因素转向精神层面需求的满足，该需求随即成为决定其留学满意度和“中国故事”讲述倾向的关键变量。尽管面临语言屏障（尤其对英文授课项目学生）、文化差异以及高校管理体制下中外学生物理社交距离较远等挑战，许多受访者通过主动融入中国社群或在留学生内部建立强韧的互助社区，使其归属需求获得替代性或补充性满足。然而，社会互动中遭遇的隐性偏见（如不当言语、偷拍行为）、特定地域文化（如方言区的沟通模式差异）带来的适应困难，则对其自尊需求构成实质性挑战。值得关注的是，非洲留学生普遍展现出较强的心理韧性，能够通过自我调适、学业成就的支撑以及亲友支持，逐步重构自尊体系，避免消极社交体验影响其来华留学整体满意度。

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是决定非洲学生来华留学满意度的核心变量。研究发现，非洲来华留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呈现出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第一，高校层级是重要分水岭。一流大学（“985/211 工程”高校）拥有相对较优质的学术

^① 对来自肯尼亚彼得（Peter）的访谈，2020 年 1 月 23 日于内罗毕。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46 页。

资源、更广泛的国际交流平台以及较高的英文教学质量，其留学生往往能获得更充分的学术资源与学术发展机会。第二，授课语言具有较大的影响。参加中文授课项目的学生，通过深度融入中国学术环境并掌握语言优势，其学业满意度和未来职业发展预期普遍高于依赖英文授课的留学生群体。后者常反馈教学质量与中文授课项目有差异、实践机会受限，部分亦担忧宽松的学术要求可能损害中国学位的国际声誉。第三，中国高校文凭在部分非洲国家的认可度尚存挑战。受中非关系复杂性影响，学历价值认同成为影响非洲来华留学生归国后职业发展的重要变量。来自中山大学的欧东和北京大学的门杜等杰出个案，生动诠释了当高层次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时，非洲留学生不仅能实现个人抱负，更能成为中非友好的天然纽带。

基于上述发现，为提升非洲来华留学生的获得感与满意度，使其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积极力量，亟须构建系统化、全周期的支持体系。

第一，完善奖学金体系与经济支持机制，强化基础保障。动态调整奖学金标准，针对不同地区生活成本差异（如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建立弹性补助金发放机制，确保覆盖留学生基本生活需求。拓展奖学金类型，除政府奖学金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设立专项奖学金，聚焦非洲国家发展急需专业（如公共卫生、新能源、数字经济等），增强留学项目与非洲本土发展需求的对接度。

第二，构建多元文化融合机制，打破社交与归属困境。高校可通过举办文化工作坊（如中国书法、非洲鼓乐体验）、联合志愿活动等形式，降低中非学生互动门槛。例如，借鉴北京大学“国际文化节”模式，定期举办非洲文化展、美食节等活动，增进相互认知。优化留学生管理体制，尝试在中文授课项目的留学生中试行与中国学生统一的住宿管理，鼓励英文授课项目学生选修中文课程并参与中国学生社团。同时，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简化留学生参与校园活动的审批流程，避免因管理差异引发的归属感缺失。

第三，提升教育质量与学术支持，助力非洲留学生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加强对授课教师进行教学评估，确保专业课程的国际化水准。建设面向来华留学生的辅导员队伍，为非洲留学生提供从课程选择、科研选题到职业规划的有效指导和规划。进一步深化中非高校“20+20”合作，为非洲留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实习机会。

第四，改善社会认知环境，构建包容友好的舆论生态。加强媒体正向引导，主流媒体可策划“非洲留学生在中国”系列报道，聚焦其学术成就、文化贡献及跨文化融合案例，改变公众对非洲国家“贫困”“落后”的刻板印象。例如，参考中央电视台出品的《外国人在中国》栏目，制作非洲留学生专题纪录片，展现其多元立体的“中国故事”。在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城市，通过举办社区活

动、中小学国际交流课程等形式，为非洲留学生提供与当地社区交流的机会。

第五，增强学位国际认可度，提高来华留学项目的长期价值。推动学历互认与职业资格对接，加快与非洲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尤其在医学、工程等关键领域，建立联合认证机制。以在非洲的中资企业为依托，为有中国学习经历的非洲学生提供就业机会，提升“留学中国”的就业竞争力。同时，加强发展留学生校友网络，定期组织学术交流、商务合作活动，利用校友资源拓展中非教育、经贸合作渠道。

综上所述，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影响非洲留学生来华动因与满意度的多层次、动态化因素，更从微观个体体验的视角，映射出中非高等教育合作在迈向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机遇。非洲留学生的“中国故事”能否成为展现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生动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能否为留学生群体构建一个满足个人发展、赋能个人梦想的包容性生态。这不仅关乎留学生个体的成长，更是中国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深化中非民心相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陈雅慧)

benefiting three groups: Chinese living in their hometown, Chinese living or working in Africa, and African living in their neighbor communities. Their philanthropic support covers areas including education, disaster relief, community safety initiatives, and public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Unlike traditional charity, these practices transcend ostentatious homecoming gestures or detached benevolence. They stem from practical needs of transnational livelihoods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 toward communities vital to their business and social well-being. This study uncovers the mechanism driving new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 shift from philanthropic particularism to universalism in Cameroon: particularism persists toward ancestral hometowns and kin groups, motivated by practical hometown solidarity and securing social capital through hometown-origin networks; universalism extends to local African communities, driven by livelihood demands and the need to build harmonious local relations. Such philanthropy embodies the transnational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munal values, specifically co-residence and reciprocal goodwill. The philanthropic practices of new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meroon offer a unique case study for transnationalism research among globally mobile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challenge the classical Weberian notion that particularism and universalism are rigidly separate, revealing how these entrepreneurs build amicable community ties in both origin and receiving societies: not to assimilate or integrate to either mainstream society, but to converge different communities to support their cross-border business and living.

Keywords: new Chinese migrant entrepreneurs in Cameroon, philanthropic behavior, particularism, universalism

Authors: Li Xiyuan,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Development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Wen Guozhu, Lecturer of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A Multi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Education for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An Analysis Based o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Li Mingru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s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s and experiences of 56 African students and alumni in China through semi-

structured interview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ir decision to study in China is primarily driven by material needs, including affordable costs, scholarship support, a safe environment, streamlined application proced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fter arrival, their focus shifts towards satisfying higher – level psychosocial needs such as belonging, self – esteem, and self – actualization, while facing challenges including cultural barriers, social isolation, social biases, disparities in academic support, and degree recognition. Results suggest that although physiological and safety needs are generally met, satisfaction of psychosocial needs directly shapes the emotional tone of the “China’s story” narrative of Afric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University rankings,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gree recognitio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fulfillment of self – actualization needs. To this end, this study proposes optimizing the experience of Afric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y enhancing scholarship systems, building platforms for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mproving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boosting degree recognition,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active ambassadors for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is study provides micro empir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Keywords: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Cross – Cultural adap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uthor: Li Mingru, Postdoctoral Fellow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Thirty Year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outh Africa: History, Dilemmas and Prospects

——Interview with Justice Albie Sachs, Architect of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

Albie Sachs and Zhu Pengfei

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and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rough an in – depth interview with Albie Sachs, the former Justice of the South African Constitutional Court widely recognized as the “Father of the Constitution”. Drawing on his dual perspective as both an institutional architect and key participant, this study examines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contemporary dilemmas of South Africa’s democratic transition. The interview covers Sachs’ revolutionary